

的合作水平。同时，中国应做好相关利益补偿工作，在介入中亚地区经济事务的同时，提升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避免因观念和利益的分歧而降低相互信任水平。

● 试析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障碍

张艳璐（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凭借地缘优势，中亚得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连接欧亚、沟通东西的天然桥梁；成为地缘政治家眼中可以控制世界的大陆岛；也因此成为大国竞争的演武场。自“冷战”结束后，中亚长期是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地区之一。域内和域外国家针对中亚所提出的一体化计划层出不穷，并呈现相互竞争的态势。与此同时，在嘈杂的一体化呼声中也夹杂着追求民族独立的“去一体化”声音。这些情况叠加最终导致中亚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不仅严重阻碍了区域内各国的发展，也威胁到全球的安全和稳定。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在各国间相互依赖与互为条件不断加深、共同利益广泛存在的背景下，以保证各国独立发展为前提缓解和消除一体化过程及其恶性竞争所带来的问题成为当今中亚一体化进程推动中的关键。为此，中俄两国领导人率先作出了大胆的创新性尝试，在2015年5月8日的莫斯科会晤上共同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试图通过建立一套具有创新性并切实可行的战略对接合作机制来实现中亚，乃至欧亚区域内一体化进程的整合，从而达成保证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①的目标。

目前，尽管“一带一盟”对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②，且战略对接的合作模式也得到了机制区域内各国的广泛认同。但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指出的那样，当议题在国际层面上互相独立地处理时，从简单的官僚政治意义上讲，将它们安排在一起处理常常是困难的。加上成员国政府内部出现对这种协调行为的抵抗，协调不同国际组织的政策注定是困难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5年5月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509/c1002-26974448.html>

^② 这里的客观条件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行动原则上的相近性、在战略目标上的一致性以及在框架思路上的互补性。

的^①。所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障碍，并集中表现在结构差异、战略行为不确定性以及安全保障等层面上。

（一）“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的结构差异问题

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前者是设置有高于政府的执行机构并按照《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履行其相关职能的结构紧密、以对抗为目的的结盟体系；后者则是不设置任何组织框架并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双边合作或者小多边的政府间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结构松散、包容性强的伙伴共生体系。这导致二者在对接过程中将面临诸如执行主体不匹配、重复谈判等一系列的阻碍。但幸运的是，“一带一盟”的结构差异事实上仅停留在表层形式上，其内在深层次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在国际秩序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以开放、合作的理念谋求欧亚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可以借助直接或间接参与彼此地区合作制度的制定、建立共同参与的对接进程执行机构、及时调整各自在建的项目安排、协同制定新的国内和国际项目规划等措施来弥合二者的差异，促进其合作。

（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的战略行为不确定性问题

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的—个基本事实，其在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②。因此，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横亘在“一带一盟”之间的又一障碍，对两者的对接进程造成诸多困扰。而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归根结底是一个信息不完全性的问题，是认识、判断以及信任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时需要将重点放在信息的充分沟通、增进共识以及建立和巩固互信上，并根据不确定性因素的特点分别予以化解。具体而言，对于不确定性内部维度的实力和利益因素，由于二者较易量化测定，所以，有可能通过组织各战略对接合作参与国的智库机构来共同编制国家利益和实力的量化分析指数，以此来缓解和消除因利益和实力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阻碍。而这一指数不仅将列明各国的核心利益范围，还将划定区域内各国的共同利益范畴。同时，由于国家实力和利益都是动态性的变量，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所

^① [美]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信强、何曜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② 唐世平、王凯主编：《历史中的战略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以，在指数中还应体现国家实力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及其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因素的相互影响性。

对于不确定性内部维度上的意图和决心这两个因素，由于其影响力更多的是通过主观性的意识形态、共识等途径来表现，所以难以量化测定。因此，化解意图和决心不确定性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增强国家间的互识互信等方面上。而互识互信的建设有赖于准确而充分的信息互通。为此，在“一带一盟”的对接过程中除充分利用已有沟通平台，还可补充构建不同层次的新对话机制和信息交换体系，并加强语言教育和推广，以便提高信息传递的速率和准确度。同时，可以加强大众阶层人文交流合作的资源投入，以进一步扩展信息传递的渠道，进而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此外，还可尝试构建符合本区域经济特点的信用风险评价系统，以便维护和提高各国的信用水平。

在不确定性的外部维度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作为欧亚地区博弈的重要棋手，是影响“一带一盟”对接的重要因素。目前，西方学者始终不看好中俄两国围绕中亚地区的高水平战略合作，认为这是“违背两国本性的，其原因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没有给予中俄两国其他的选择”^①，并始终致力于分化中俄，乃至欧亚各国间的关系，寻找并激化“一带一盟”规划中所存在的矛盾，妨碍战略对接合作的推进。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得益于美国明里或暗里介入本国内部事务所造成的刺激，使得以中俄为首的各欧亚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都意识到建立大欧亚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际上充当了欧亚地区合作氛围的营造者，扮演了欧亚各国战略对接合作幕后推手的角色。然而，如何在利用西方所营造的紧张局势构建大欧亚命运共同体的同时，避免各国合作关系因固有分歧、矛盾的扩大而导致的破裂又成为各战略对接合作参与国不得不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事实上又绕回到战略行为不确定性的内部维度上，是由各行为体对彼此实力、利益、意图和决心缺乏认知和准确分析而引发的问题。因此，其化解的关键仍在于加强各层面的信息沟通，增进共识和互信，从而避免由外部环境原因而导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以及冲突的出现。

（三）“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的安全保障问题

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构建过程中都面临严峻的安全

^① Генри Киссинджер. Обама скорее идеолог, чем стратег. <http://www.globalaffairs.ru/diplomacy/Genri-Kissindzher-Obama-skoree-ideolog-chem-strateg-17659>

问题。例如，欧亚经济联盟在西部面临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的挤压，安全边界不断收缩；在南面则面临“三股势力”的困扰；在东面和北面则存在领土争端。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构建过程中不仅受到中亚、中国西部、中东等地区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威胁，同时还深受南海和东欧等地区局势的影响。因此，安全领域合作也是“一带一盟”对接过程中的重点之一。但是由于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都是侧重于经济合作的机制，缺乏安全保障方面的制度安排，同时考虑到两者的主要参与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峰会等地区安全组织的成员，所以不妨在“一带一盟”的对接过程中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①在欧亚安全合作方面的优势，以其为基础并结合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等各自独有的平台资源，同时补充增加新的双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构成一个大欧亚安全保障网。

总而言之，建立在不同政治、经济和文明基础之上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对接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结构差异、战略行为不确定性、安全保障缺乏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一带一盟”在重塑欧亚大陆格局、改变国际经济制度、重构世界秩序等核心目标上的一致性。在困难和纷争的表象下隐藏着广阔的合作空间。然而，要拨开问题的云雾显现合作共赢的彩虹则需建立良好的互信和高效的合作机制，并保障各国在一体化下的安全和发展，以增强战略对接合作模式的凝聚力，防止因个体脱离而造成的整个合作进程的失败。因而，在“一带一盟”对接过程中需要战略覆盖区域内的各参与国加强沟通、增强互信，在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保证各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达成妥协，共同努力克服不利影响，并实现“一带一盟”在实践和思想等层面上的全面对接，从而破除欧亚大陆难以协调一致的论断，在欧亚大陆上构建出一个隐形的“欧亚丝绸之路联盟体系”。

(责任编辑：农雪梅 徐向梅 李丹琳)

^①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乌法双峰会的记者会上强调上合组织在欧亚合作发展中的职能转变。他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优先合作方向由创造经贸合作发展条件转变为保证地区稳定和及时应对冲突和危机情况。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о итогам саммитов БРИКС и ШОС.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9909>